



一本打开的书

第三部

卡维林 著



一本打开的书

——

——

一本打开的书

第三部

希 望

〔苏联〕卡维林 著

唐其慈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В. КАВЕРИН
ОТКРЫТАЯ КНИГА

根据“В.КАВЕРИН·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ШЕСТИ ТОМАХ·ТОМ ПЯТЫЙ”.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 1965 译出

长篇小说《一本打开的书》共分三部。一九五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其第一、二部(近已再版),这是小说的第三部。小说的前两部是从英译本转译的,第三部是根据苏联一九六五年出版的原文版本直接翻译的。为便于读者阅读,第三部在译名处理上尽量与译本的前两部保持了一致。

一本打开的书(第三部)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05,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9\frac{1}{4}$ 插页 2
1984年2月北京第1版 198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6,000

书号 10208·171

定价 0.90 元

目 次

第三部 希 望

序曲·····	745
急剧的转变·····	752
归来·····	755
去斯大林格勒·····	764
全都做了吗? ·····	767
不是谈战争·····	772
德罗兹多夫医生·····	779
八月二十三日·····	782
邻床病友·····	787
早该如此·····	791
迷魂阵·····	804
向人类讲述·····	813
兄弟俩·····	821
伊莉扎韦塔·塞尔盖耶芙娜·····	825
老朋友们·····	839
真心诚意·····	853
家庭·····	859
高贵的客人·····	864
安德烈——斯大林格勒的来信·····	869

四个月·····	870
流言蜚语·····	875
这么说,我没有被打死? ·····	877
事业和敌人·····	888
有人插到我们中间·····	897
伏洛佳·卢卡谢维奇·····	903
只剩我们俩了·····	910
一点儿闲空也没有·····	914
一路顺风·····	921
主要仲裁人·····	924
光阴一去不复返·····	928
什么也不能改变了吗? ·····	936
这发生在昨天·····	940
德米特里·李沃夫的日记摘抄·····	949
这发生在昨天(续)·····	962
不得不加紧干·····	967
在沙漠里·····	978
一桩确切可靠的案件·····	992
某日某时·····	996
需要撒谎·····	999
儿子·····	1008
深夜人声·····	1012
尾声。战后日记摘抄·····	1025
尾声。杳无音信·····	1029
尾声。一九五六年·····	1031

序 曲

“莫斯科，莫斯科……您还是请坐吧，符拉森科娃同志。老是这个样子。不给咱们接莫斯科！”

雨点敲打着边境小城电报局小楼的屋顶。窗户上淌满雨水，雨水顺着护墙板哗哗直流，又水花四溅地冲出排水管。一刻也不停。透过玻璃窗上错综流淌着的大股雨水，路灯的光看上去好象被折断了似的。

“得等一等，符拉森科娃同志，看来，莫斯科现在顾不上咱们呢！”

是啊，得等一等。女电报员长得象玛申卡·斯彼希涅娃——身材瘦小而挺直，动作从容不迫，一张温和的脸庞。我看着她工作——纤细的手指灵巧地喀嚓喀嚓往一个个插孔里塞着插头。

“您还不如躺一会儿，符拉森科娃同志。您神色疲惫。接通莫斯科，我就叫醒您。”

“多谢。我等一会儿好啦。”

其实，说真的，我可瞌睡啦！雨点不紧不慢、令人宽慰地敲打着，而小城正是在这种敲击声和哗哗声中，在这种零零落落和一阵一阵的雨声中沉睡。小城在距离前线、莫斯科和大家谈论不休并左思右想的一切有着千万公里之遥的地方睡着。我们在这样一个夜晚、在这些日子里、在远离前线千万公里的地方

忙什么呢？

“我们正在采取措施”——在防疫遮断线后面发生了几起亚洲型的霍乱。我们把噬菌体发给边防战士和居民。我们把所有来自国外的人都安置在检疫所里呆上六天。我们销毁他们随身带来的东西。我们挡住船只，把货物加以消毒……

霍乱并没有流行起来，一场虚惊！早就该回莫斯科了。但不能回去，因为没有接到命令。不能回去，因为莫斯科老接不通。

“喂，是谁啊？我要莫斯科。”

脑子里乱七八糟。我似睡非睡。安德烈从黑暗中、从半暗不明的灯光中走了出来，灯光摇曳着在滴满雨水的玻璃窗上闪烁。你在哪儿，我亲爱的人？你身体好吗？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就把巴符利克和奶奶一起送回洛巴兴了呢？——我们不是说好要他们等我回莫斯科的吗？为什么要回洛巴兴呢？我们在那儿早已举目无亲了。唉，心里多乱和惶恐不安啊！精神又是多么紧张、无聊和疲惫啊！

“莫斯科，莫斯科……占线。莫斯科接不通。”

大衣口袋里放着用报纸包着的早餐。我展开报纸。“在克林、沃洛科拉姆斯克、图拉和罗斯托夫（顿河罗斯托夫）地区，战斗进行得特别残酷。”我无数次反复阅读这一份最新的战报。

“您吃夹肉面包吗？”

“多谢，我没工夫。”

似睡非睡。雨点在敲打。姑娘的发报电键在敲打。得了吧，我真的是在捷尔梅兹吗？开阔的城市和迤邐的大河展现在眼前。是罗斯托夫吗？路灯柔和而明亮的灯光照射在林荫路两旁的椴树上。米加现在何处？“不和你们在一起，我觉得无

聊，”他在最后一封信里这么写道。“咳，我们这么难得见面，难道不是一种过错吗？”

是啊，我们本可以更经常地见面的。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人，你离开了他们，虽然也可以生活下去，但却并不很想生活下去，而这样的人，为数是不多的。到底为什么我们——我和安德烈——会让他这么多年，七年或八年，住得离我们这么远？他独自一人，他的生活并不顺当——还是说，令人感到并不顺当？他显老了，他的鬓角斑白了。有什么办法让他回莫斯科吗？

天色晚了。浓厚的乌云放射出可怕的异彩，呆然不动地笼罩着田野和森林、大海和河流、城市和乡村。

“莫斯科，莫斯科！莫斯科接不通。”

砰的一声门响，我睁开眼睛。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走进了屋子，他脸上湿漉漉的，雨衣也是湿漉漉的。这是维克多·密尔兹里雅科夫——这可是青天白日，不是做梦。

“塔吉雅娜·彼得罗芙娜，我来替您。我向女主人借了一把伞。给您雨伞，回去休息一下吧。”

“您干吗钻到这里来了，维加？我不能离开这儿。保不定我一走，倒接通了呢？”

“莫斯科，莫斯科……是谁啊？是莫斯科吗？6局6154。喂！符拉森科娃同志，请说话。”

“我是保健人民委员部的值班员。”

“我找马雷晓夫……米哈伊尔·阿历克赛耶维奇，是您吗？我是符拉森科娃。”

“您请说吧，塔吉雅娜·彼得罗芙娜。”

“报告：工作全部结束。推测并未得到证实。请允许返回莫斯科。”

“不，塔吉雅娜·彼得罗芙娜。飞塔什干。”

“去塔什干？”

“是的。在那儿接受特殊任务。”

一阵停歇。

“我一个人去，还是全组一起去？”

“还有什么人？”

“密尔兹里雅科夫和两个实验员。”

“密尔兹里雅科夫留下继续观察。”

“米哈伊尔·阿历克赛耶维奇，难道您没有考虑，我在莫斯科……”

“少提些问题，塔吉雅娜·彼得罗芙娜。研究所撤到后方去了。”

又是一阵停歇。

“最近见到过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他从前线回来后，又走了。他问起您来着。我告诉他，您平安无恙。”

“我倒没什么！您怎么样？”

“平安无事。我正忙着呢。祝您顺利，塔吉雅娜·彼得罗芙娜。”

“祝您幸福。”

……我们走到街上，维克多为我撑开那把老式的大红伞。

雨愈下愈大。雨点似乎在进行一场疯狂的搏斗，时而旋转，时而碰撞，时而汇成一片。它们擂打着屋顶。它们沿着沉睡的边陲小城夜间空荡荡的街道狂奔。

“那末我要留在这儿啦？这也没有什么，在这儿也能找到工作做。塔吉雅娜·彼得罗芙娜，如果把噬菌体倒到井里作个试验，您认为会怎么样？说实在的……啊，塔吉雅娜·彼得罗芙

娜，您好象在哭？”

“瞧您说的，维加！这是雨水。到底要到什么时候，这场讨厌的雨才会下完啊？我们到边防部队首长那儿去，维加。需要打听一下，什么时候有飞机去塔什干。”

为什么我如此敏感地回忆起捷尔梅兹的这一夜？难道因为我当时还不习惯于战争凄苦的感受？还是因为我当时苦于意识到自己孤零零地被抛弃在这座干净得犹如花园的小城里？我不知道。后来我很快就明白了，这种情绪是虚假的。不过当时我确实觉得我们在远离前线几千公里的地方所从事的一切，都同战争沉重的考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细小的关系。

……我收到了来自洛巴兴的信：阿格尼雅·彼得罗芙娜在玛莱·米哈依洛夫斯基大街上，离我和妈妈过去有一个时候曾住过的那幢房子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屋子。她没有找到熟人，只找到了一个叫杰久林的人，他在阿格尼雅·彼得罗芙娜主管文化宫期间，曾在这幢房子里当电工。但后来她又偶然在大街上碰上了阿加莎——就是那个肥肥胖胖、和和气气和谨小慎微的阿加莎，她在革命前就在李沃夫家做事。于是阿加莎凭着老交情帮助奶奶料理家务。我读到这几行时，高兴得松了一口气；阿加莎虽然有着我自童年时代起就永志不忘的那些怪脾气，但无论怎么说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此外，从这封信来看，奶奶的情绪也很振奋。我原来很害怕她会张惶失措，现在看来并没有如此！这封信的句子很短，笔迹刚劲而果断，所以从各方面可以看出，阿格尼雅·彼得罗芙娜重又感到自己是过去那个精力充沛、精明强干、抚育两个儿子长大成人的“大小钢琴出租站”的女主人了。

安德烈已从前线归来，自八月份起就一个人住在莫斯科银

子胡同战前分给我们的那套新寓所里。“我们互换了职业，”他写道，“你已成为马雅可夫斯基所说的‘开水的歌手和生水的死敌’了，而我则坐进实验室从事你所熟知的疫苗研究工作。暂时什么结果也没有，或者说，几乎什么结果也没有，而且爷爷肯定地说，这个东西‘几乎早在上世纪末’就已经被他发现了。我问他：当时他为什么撒手不干了，他答道，他去干另一件‘比较不那么绝望’的事情去了。你看他这个人怎么样，嗯？”

爷爷就是尼科尔斯基，不管亲友们如何坚决劝说，他还是拒绝离开莫斯科，而安德烈在研究的疫苗，就是防止斑疹伤寒的疫苗。至于“坐进实验室”这句话，那不难猜出，安德烈是把期望的事当成实现了的事啦，因为他已被任命为一所规模巨大的生产制造研究所的所长，唉，他能呆在自己实验室里的时间，一周还不到两三次。

他是否每天都吃午饭，关于这一点，他没有写到。当我最后生了气，他才回信说，上班的时候感到那么美好、那么暖和和那么舒服，以致他立即选择在研究所里过夜，再说，不与我和巴符利克住在一起，这套空荡荡的寓所令人难以习惯，他觉得有点象戈壁的沙漠……

我们长时间没有米加的任何消息，其实我到处都在打听他的消息啊！不管命运或（更精确地说）流行病突然发生的危险性把我扔向何方，我首先寻找从罗斯托夫来的人，找到后，就打听米加。一位我在飞机上认识的军医说，米加与实验室一起撤退到纳尔奇克去了，我于是立即写信去，可是没有回音。在克拉斯诺沃茨克有一个护士知道我在打听米加，就四处寻找我，她说了一大车话，把我吓得要死。按她的说法，米加在我们军队撤离罗斯托夫前夕病得很重，若不是戈尔杰娃医生把他藏在地窖里，护

理好他的病，然后与他一同投奔游击队的话，那他无疑就会留在城里了。我不相信她讲的这番经历——这个护士带着歇斯底里狂喜的神情议论米加，然后又脱口说出她仅有一次在卫生保健文化宫的公开讲演会上见过米加，这使我感到离奇。不过我即使极力让自己不要去相信这个衣衫褴褛、令人厌烦的长舌妇说的任何一个字，但终究免不了要想：这即使是流言蜚语，也总归事出有因！所以心里感到惶恐和凄楚。

我写信给安德烈，他也同意我的想法，说这一切都是胡说八道。但是对阿格尼雅·彼得罗芙娜可怎么办呢？她每封信一开头就提出问题：米加在哪儿？“千万别隐瞒真情，”她提出请求。“我的心觉得出来，他有了不幸，马上知道真情比由于不明真相而长期受折磨强。”

过了两三个月，忽然——这是在塔什干，十二月底的时候——一位熟识的微生物学家问我：“您知道吗，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在到处寻找您？”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在到处寻找我？我到处寻找他已有半年了！”

“可他在寻找您。或者说在寻找他弟弟。”

我飞奔到研究所，去寻找这张已在办公室里躺了一个多月的价值连城的窄纸片——顿时好象有一只手把我心头的一块石头搬开了。这是一封简短的、只有几个字的查询函，打听我和安德烈的去向：研究所里有没有人知道我们离开莫斯科后到哪儿去了？在米加——无疑是米加——的签名下面，打着战地邮戳。

两周后，在阿斯特拉罕噬菌体研究所里，后来又又在古比雪夫噬菌体研究所里，我找到了完全一样的查询函。米加的做法很简单：他写信给所有的噬菌体研究所的所长——不管是认识的

还是不认识的——他合情合理地估计到，微生物学家们应当知道他们的同事撤退到哪儿去了。就是不知为什么他肯定我和安德烈已经撤退。

他到底在哪儿下落不明地呆了那么久？为什么最后当我们终于通上了信的时候，他却又不明不白、含糊其词地回答我提出的问题？他只在字里行间提到，他曾步行了一千多公里。还说：“相逢时面告一切。可我们能相逢吗？何时何地？谁能知晓？”

急剧的转变

早在青年时代，在那个遥远的时代，当我还在写自己头一篇介绍性的学术报告时，尼古拉·华西里叶维奇就警告我说，在科研工作中存在着“闭门造车”的危险性，“实验室的玻璃世界”本身就蕴藏着危险性。那几年我正在从事医生的实际工作还是从事科研工作这两者之间进行抉择，当时我朦朦胧胧地揣摩着，要是离开了这个“玻璃世界”，我不能也不愿意生活下去。当我从国营谷物农场回来之后，我在实验室里整整呆了八年，连想都顾不上想那些警告和危险性。不过，我并没有忘记它们。我只是觉得，一开始把我与工业，然后又把我与医院联系起来的这项工作本身，就打破了很多科学工作者生活其中的魔力圈。于是我一生中坚持不懈地努力排除妨碍我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一切干扰的那个特殊时期开始了，并一直持续到了战争发生之前。

但到了一九四一年夏天的一个星期日，就好象打了一个急转弯似的，以往的生活消失了，突然变得一清二楚，我过去就是在实验室的玻璃世界里生活。现在，我象一颗红色的信号

弹——“进攻”的信号——从习惯的环境中飞了出去，孤零零一个人，没有同事，没有实验室，去从事战前没有任何概念的工作。从莫斯科到捷尔梅兹、从捷尔梅兹到塔什干，然后又到克拉斯诺沃茨克、阿斯特拉罕、萨拉托夫。我这个专门从事药物研究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变成了流行病学家和保健医生。我象我的千万个同志一样，做卫生学报告，为公共澡堂筹办劈柴，为医院筹办用品。我同当地的行政人员吵得不可开交，就因为他们不愿把自己宝贵的时间花费在防止流行病这一类的琐事上。我追缉倒卖保健证件的投机商人（当然是在民警局的协助下），因为没有这种证件，就不能购买火车票。

主要的难处在于不仅必须预防在城乡业已定居下来并生活在正常条件下的居民发生疾病，而且还必须预防数十万沿着铁路和公路缓缓向东前进的人群发生疾病。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在这种大规模迁移的某些时候，必须停下来等待交通工具，这就可能发生人群大量集中和拥挤的情况。于是就得象派遣其他从事预防流行病工作的官兵一样，把我也派遣到那个地方去。

我说：官兵——这并非失言。我们确实组成了一支军队，是一支庞大的军队，它不声不响、昼夜不停地在行动，它既在公路上，又在车站上，既到农庄去，又到工厂去。这支军队有自己的司令部，有自己的侦察兵，还有自己的战略、战术——当然，也有自己的战线，而关于这条战线，在总司令部的战报中不会提到一个字的。在这条战线上进行的战斗一会儿遍及一片辽阔的地带，一会儿局限在窄小拥挤的行军实验室里。战线是无形的，听不见炮弹和炸弹的呼啸声和轰隆声。

我的一部分同事留在莫斯科，而为数少得多的另一部分同

事（有维克多和卡佳·季曼特）则来到了塔什干。当然，根本无法考虑科研工作，尤其我本人几乎没有在塔什干安顿下来，而只是马不停蹄地来去匆匆。尽管我们连庇身之处也没有，更不用说动物和仪器，但是我们还是想着手一项工作。

过了一两个星期，我们找到了房子，也装配了仪器。但老鼠的问题更为棘手。没有老鼠——当然指白老鼠，因灰老鼠不适合于做试验——而且根本没有希望能搞到白老鼠，尽管那个时候，塔什干市场上，似乎除了天上的星球而外，几乎什么都可以弄到手。

不过我到底还是上市场去了。我有一个想法：我们的“那项工作”可以出色地用豚鼠来作试验，就是一卢布抽一签，给人算命的那种豚鼠。

我不打算细致地描述我在塔什干市场上的奇遇：头一个算命的女人怀疑我是一个危险的竞争者，就立刻果断地拒绝任何条件。与第二个算命的女人谈话时，我从离题较远的地方开头。首先，我抽一张签，上面写着：“您的愿望一定能实现”，然后我又抽一张签，上面写着：“放心吧！您的打算能成功。”接下来，我让她知道，我是一个医生。我们谈了谈疾病的事。最后，我打听出这个算命的女人还有十只豚鼠在受训练，于是我摊了牌，我出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要她把这批豚鼠都卖给我。我想，即使我提出要与她一起飞上月球，大概她也不会比听到这个要求更感到吃惊的了！这个算命的女人惊呼了一声，咬紧嘴唇，差一点要用装着她全部简单家当的箱子来砸我。

但并非全部豚鼠的主人都以如此剧烈的盛怒来接待我的。有一个中年男子甚至把我请到他家里去，耐心细听我那番说他可以给人类以无可估量的贡献的热情话。不过他听完之后，还

是拒绝了，说什么，天知道人类什么时候可以从我的工作中得到好处——再说，到底能不能得到呢？——而他眼下就要吃亏了。

最后，我终于买到了十二只豚鼠。然而试验还是没有做成。马雷晓夫把我召到了莫斯科，并建议我从事霍乱噬菌体的研究，因为根据占领区传来的消息，在我们反攻时可能需要霍乱噬菌体，后来反攻开始时，果真出现了这种需要。

归 来

我们整个家庭生活的内容实际上不外乎离别和重逢。我们长期相距万里，人各一方，已不下于数十次，似乎可以习惯于这种一次接着一次、从不间断的别离了。然而对于这种别离是不可能习惯的。如果战争同时降临到我们头上，而我们手挽手地步入这新的不可知的生活的话，那我还会感到轻松些。可战争是在我们小组正在捷尔梅兹的时候开始的，而不管我如何安慰自己，设想我所有的亲人——如果真是所有的亲人——都平安无恙，奶奶和巴符利克在我不在家的情况下好好地在洛巴兴安顿下来了，安德烈能够安排好自己的光棍生活，可一想到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我不在家的时候发生的，而且还会继续发生，就不免时时感到害怕。现在——总算到头了！——归我的一切又都该由我来过问了：可以托火车上熟识的列车员给巴符利克捎包裹（安德烈在车站上告诉我的）；安德烈不知道他用九百二十个卢布在市场上买了一公斤黄油是否合算；发给他的浓缩食品被他放在温度难得高于零度的食堂里了；在检疫研究所里，一半工作人员，说实在的，应当解雇，而另一半则应从头教起。诸如此类，